

# “战争乃残酷之师”\*

——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帝国的能动蜕变

苗中泉 时殷弘

**【内容提要】** 战争是赤裸裸的暴力对抗,是一个武装集团对另一个武装集团的暴烈行动。战争有其固有的能动逻辑,会深刻影响乃至重新塑造投身其中的一切人物和集团。在性质、时间和烈度上均属希腊世界史无前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通过引发失控、刺激爱欲、制造普遍恐惧和普遍怀疑,产生了一种能动的释放效应,教唆人们诉诸种种可怕的事情,那是他们在安宁和平时期以人的理性谋划永远不会或不敢考虑的。这种可怕的释放效应又因“偶然”的天灾而倍增,把雅典从一个审慎、节制的仁慈帝国蜕变为蛮横、专制的残暴帝国;把推崇自由的斯巴达蜕变为波斯强权的附庸;把典雅有致的希腊文明蜕变为野蛮恐怖的自然状态。这场由希腊人自己发动起来的超级内战,最后以完全超出任何一个希腊人想象和控制的结果,彻底变异了整个希腊。战争乃残酷之师,这是史家修昔底德真正意欲垂诸久远的历史教益。

**【关键词】** 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帝国的蜕变;战争的释放效应

**【作者简介】** 苗中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87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7)01-0098-32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 一 引言

在其最宽泛的理解上，“兵者”，作为“战争”的含义，约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大战略家孙武凝练地概括了它对国家的重大影响：“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sup>①</sup>然而对一个旨在以决胜之道赢得君王青睐与重用的异国将军而言，<sup>②</sup>战争之于国家的意义似乎是一种先验式的、不言自明的状态，因而，伟大的孙武在这样一句简要描述之后，再也不肯费半点周章去论述战争对国家的影响。倒是在大约晚于孙武一百多年之后的希腊世界，有着伟大文学与史学才情的卓越将军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亲身经历其中一部分并冷静地剖析了被他称为希腊世界最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sup>③</sup>之后，在耳濡目染了战争中希腊诸邦国的重大蜕变与堕落之后，不无悲悯地慨叹道：“战争乃残酷之师。”<sup>④</sup>不过修昔底德并未系统论述战争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国家(连同社会、个人)残酷的教师。在价值判断和客观描述之间，毋宁说，他更愿意以其所坚持的客观呈现战争史料的方式，为后人提供“垂诸久远的教益”。<sup>⑤</sup>直到两千多年后，另一个在战争理论研究上堪与孙武匹敌的伟大战略家、普鲁士的卡尔·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将军才第一次纯粹以战争为研究对象，细致入微地洞察出战争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其作为暴力运动的内在逻辑，如何一步步深刻地改变人世、能动地改变深陷战争之中的各个部分。那就是他所揭示的战争的能动逻辑：“战争是两大活生生力量之间的冲撞……其首要属性就是，暴力本身有自己的逻辑，即武力不断升级的倾向……其中根本的动能，在于两大活生生的力量冲撞时产生的仇恨、激情、恐惧、兴奋和赌博心态等，从而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动。”<sup>⑥</sup>“战

<sup>①</sup> 孙武著，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兵法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7—1678页。

<sup>③</sup> 史学界一般将公元前457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将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战争称为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包括了“阿奇达慕斯战争”(The Archidamian War, 431B.C.-421B.C.)、“西西里远征”(The Sicilian Expedition, 415B.C.-413B.C.)和“德凯利亚战争”(The Decelean War, 413B.C.-404B.C.)三个阶段。本文所说的乃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sup>④</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Martin Hammo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0.本文所引修昔底德史书，均以本版为准。所引内容的中文翻译同时参考了徐松岩译本(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谢德风译本(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sup>⑤</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2.

<sup>⑥</sup>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翟东升、时殷弘：《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31页。

争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任何限度……无论在武器的应用、战术的选择、打击的人员目标以及其他任何方面都会毫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战斗愈是走向极端，双方暴力的使用就愈加普遍和密集，也就愈加接近战争的绝对状态。因此，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暴力行为都不会被排除在战争手段之外，否则就不是战争。因为战争的逻辑就是一步一步地走向道德的极限。”<sup>①</sup>

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以克劳塞维茨明确揭示出来的这种战争的能动逻辑，去辨识和解释主要由修昔底德记述下来的、持续近 30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希腊世界尤其是对雅典城邦帝国的变异作用，从而可望有裨益于我们真正理解何为战争，继而真正理解作为“人”的我们自己。

实际上，修昔底德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本史书，作为人类文明世界现存最早、最系统的两种历史著作之一，早已被各学科的研究者进行了诸多层次不同的研读。单就“雅典帝国的特质”这个主题而言，其成果恐怕也绝非凡篇文献梳理的文章所能穷尽。然而我们注意到，所有讨论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帝国性质的文献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雅典帝国天然地推崇暴力，无视希腊世界的国际正义，从战争开始直到临近结束，雅典人都秉持着“大胆”的特性，信奉武力统治一切。这一类观点从修昔底德记载中雅典人的演说入手，分析总结出雅典“在建立一个帝国和征服他们的希腊同胞时，只是简单地依据特定的需要以及有关恐惧、荣誉及利益的普遍冲动”的帝国主义特质，并坚持认为，这个建立在雅典人“大胆”特质之上的城邦，在战争开始之前和战争深入发展过程中并无根本的改变。<sup>②</sup> 尽管修昔底德史书中唯一一处对话体记录，即雅典人与米洛斯人（Melian）的谈判，字里行间赤裸裸地宣扬、推崇暴力，无视希腊世界的普遍伦理，被认为是雅典帝国野蛮化的缩影，但是，这类观点依旧辩称，“帝国的真相毕竟总是以武力统治。从这个观点出发，雅典人在米洛斯问题上的创新只是他们对自己及其对手更大的坦白，而他们以保守或者限定为特征的早期主张，只不过是用以指责斯巴达人和其他人道德伪善

---

<sup>①</sup>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75–77(中译本可参见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24—26 页)；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23–25。

<sup>②</sup>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192; Steven Forde, *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6–27; Edith Foster, *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02–204.

的雅典说法”。<sup>①</sup>这类观点认为,无论是伯利克里(Pericles)在战前的公开演说,还是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嘲弄,都是一种本质上相同的、基于“强力可以统治一切”的帝国主义辩护,<sup>②</sup>雅典帝国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基于武力扩张的霸权主义,而在战争中雅典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中找到合理的解释。<sup>③</sup>

另一些研究者则在这个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的立场。他们深入到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战争的各个阶段,尤其是着重探讨修氏书中记载的雅典人前后多次不同场合的政治演说和辩论,提出雅典帝国在战争中实际上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晏绍祥在概览了战争全程之后发现,雅典人在战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信仰转移,大部分人丧失了对雅典帝国民主政治的希望,甚至强烈敌视民主制度。<sup>④</sup>而那却是雅典最卓越的政治领袖伯利克里曾经高度夸耀的雅典特质之一。<sup>⑤</sup>研究者注意到,雅典帝国在战争开始之初,尚有审慎和节制的美德,然而到战争的第十八年,即雅典大军兵临米洛斯城下之时,雅典帝国已经丧失了这种美德,权势的消长已经成为决策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考量。这个时候的雅典人,其道义立场已经开始接近极端。<sup>⑥</sup>

对比上述两大类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更多地侧重解读战争过程中雅典人言行上崇尚武力的部分,并将这种武力崇拜归结为雅典帝国固有的、不变的特质,然而却从来没有说明为何是雅典帝国拥有这般特性。事实上,细致分析修昔底德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不仅仅是雅典帝国,其对手斯巴达、包括在西西里岛上与雅典交战的叙拉古(Syracuse)同样在战争开始后变得残忍、恃暴、无所顾忌,如果说雅典的帝国主义特质来自雅典人的“大胆”天性,那么该如何解释被认为保守的斯巴达人(和其他希腊人)在战争中近乎同样的帝国行径?显然,这类静态的观察一方面太过突出雅典人被认为的“特性”,以至于完全忽视了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帝国倾向;另一方面,这类观

<sup>①</sup> Steven Forde, *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 p.52.

<sup>②</sup> 毛丹:《修昔底德的正义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种政治思想史读法》,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61页。

<sup>③</sup> 彭磊:《修昔底德与帝国主义问题》,载《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第77—81页。彭磊在这篇论文中提到了伯利克里的帝国主义是一种节制的帝国主义,但是并未展开论述,同时,他又认为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可以为整个战争中雅典的一切言行找到解释,这样,在雅典帝国特质的问题上,他实际上就与福德、毛丹等人所持的立场相似无二。

<sup>④</sup> 晏绍祥:《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载《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第5—6页。

<sup>⑤</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91—92.

<sup>⑥</sup> 刘飞涛:《审慎和节制:权势与道义的脆弱纽带》,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51—152页。与之相似的观点,可参见惠黎文、时殷弘:《雅典为何终告惨败?——关于民主、内争、文化特质和战争效应的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21—25页;陈玉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现实主义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第109—110页;陈玉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正义观》,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6期,第49—50页;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载《欧洲》,2002年第1期,第3页。

点完全无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最宏大甚至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从而很可能丧失对修昔底德欲阐明的那种历史“教益”的有效感知。这大概并非体会修昔底德智慧的有效法门。而第二类观点则深刻认识到了雅典在持久战争中发生的帝国变异,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战争对这种变异的能动作用。美中不足在于他们对这种能动作用的分析略为简单。本文赞同他们的立场,同时,试图在他们不曾深入展开论述的地方有所突破。这主要体现在:(1)辨识雅典帝国从战前到战争临近尾声之际发生的鲜明的蜕变,即从审慎、有节制的仁慈帝国蜕变为狂暴、蛮横的专制帝国;(2)剖析战争可怕的释放效应,从而深入揭示在规模和时间上均被修昔底德认为是希腊世界最伟大的这场战争为何会促使雅典帝国(连同整个希腊世界)发生那样的蜕变;(3)论述在修昔底德的撰述中,战争的释放效应如何与“偶然”的天灾互相影响,从而将战争中的世界彻底变异为人间炼狱;(4)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修昔底德关于“战争乃残酷之师”的论断,从而理解修昔底德眼中的人类与世事。本文认为,那才是修昔底德欲要垂诸久远的最深层次的历史教益。

## 二 与米洛斯人的对话:狂暴雅典人的帝国申饬

我们的分析将从几乎所有关于雅典帝国和修昔底德的研究者都不会或者根本不能逃避的一篇对话体记载入手。这就是被称为修昔底德“整部著作中最多余、最有意思的段落”,<sup>①</sup>雅典人在3000海陆大军合围小邦岛国米洛斯(Melos)之际与米洛斯人进行的谈判,<sup>②</sup>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强大的雅典人对弱小无援的米洛斯人的“帝国申饬”。

原本米洛斯是基克拉迪斯群岛(Cyclades)中一个拉栖代梦人的移民城邦,与斯巴达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后,米洛斯人既没有与同种族的斯巴达人结盟,也未臣服于雅典,而且拒绝参加雅典的同盟,因而在战争中保持着一种中立的政治姿态。但是到战争的第六年(426B.C.),雅典公民大会做出决议,派遣两千重装步兵意欲征服米洛斯,并且大肆破坏米洛斯岛上土地。<sup>③</sup>之后,米洛斯就开始与雅

---

<sup>①</sup>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7, p.174; Clifford Orwin, “Piety, Justice, and the Necessities of War: Thucydides’ Delian Deb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3, No.1, 1989, p.237.

<sup>②</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301–306.如非另外注明,本节以下所引言辞均为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内容。

<sup>③</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75.

典为敌。到了战争第十六年(416B.C.)，与斯巴达签署了停战条约而处于暂时和平时期的雅典，第二次派遣重兵远征米洛斯。雅典人的“帝国申饬”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焦点是米洛斯城邦的安全问题。雅典人认为，对弱小的米洛斯而言，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臣服，臣服于雅典，缴纳贡赋，以米洛斯的“自由”换取“安全”。雅典人首先宣称，帝国的根本信条就是强力，只有强力大致均衡的双方，才配谈公正，“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强者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这意味着，雅典人在明确发出警告，已经被大军兵临城下的米洛斯城邦根本不足以与雅典大谈正义，而只能无条件服从。对此，米洛斯人予以辩驳，他们按照雅典人的逻辑，即“从眼前的利害关系着眼”，提醒雅典：第一，如果无视希腊国际正义，破坏了那些小邦、危邦可以依靠的公正原则，那么一旦雅典陷入与米洛斯同样的危难，就再也难以脱险。第二，既然雅典弃国际正义于不顾，肆意凭借强力夷灭他国，这势必会激起那些中立城邦的恐惧，从而引发它们的联合攻击，陷雅典帝国于重大危难之中。显然，米洛斯人意在提醒雅典，覆灭米洛斯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而保全并允许米洛斯中立，从长远来看反倒对雅典有好处。对此，雅典人不以为然，他们坦言，雅典真正害怕的乃是帝国臣民的反叛，是那些在帝国统治薄弱地区进攻帝国的势力，<sup>①</sup>而要消除这些威胁，就必须不断地依靠强力，将帝国的统治扩展到尽可能的地方。因此，征服米洛斯的真正好处是通过彰显雅典帝国的强大实力来震慑那些意欲进攻帝国的势力，从而增进雅典的安全。雅典人申饬道：“这场战争的双方并非势均力敌，获得战利品奖赏者赢得荣誉，受到战争惩罚者感到羞辱，而问题在于怎样保全自己，不要螳臂挡车，以卵击石。”

接着，不甘放弃城邦自由的米洛斯开始诉诸命运和血亲的援助，以寻求自由与安全两存的希望。米洛斯人提醒，战争中充满未知与变数，战前实力强大看似必胜的一方，也可能会遭遇惨败的结局，这就是命运；米洛斯人抵抗雅典人的入侵大军，乃是神性意义上的正义之举，将会得到神灵的佑护；而作为米洛斯的血亲和雅典的仇敌，斯巴达也将会派出援军，这便是米洛斯与雅典抗争的最大的希望所在。雅典人则对米洛斯人的希望予以嘲弄。他们教训道：唯有雄厚的实力才能产生现实的希望，舍此之外的一切都不过是虚幻不定的，是骗人的；神灵的佑护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依靠强力尽可能扩张，这正是合乎神性的自然法则。至此，雅典人告诫米洛斯人，如不服从，夷

<sup>①</sup> 雅典使者坦言：“我们不担心被另一个强国打败，而是更担心被那些处于帝国境外的岛民以及屈从于帝国统治并感到愤慨的臣民攻击。”

灭其城邦恰好符合神性法则,命运并不会给米洛斯人提供任何可能。至于斯巴达的援助,雅典人更是宣称,斯巴达人以本国的欲求、利害为唯一准则处置对外关系,<sup>①</sup>因而根本不会为米洛斯城邦提供援助。雅典人再一次申饬:“你们是弱者……不要求助于虚无缥缈的、预言的、神讖的和其他的虚幻力量,被这些虚幻的力量用希望所哄骗,导致灭亡。”

米洛斯人并没有被雅典人吓住。他们继续辩驳,既然雅典眼中的斯巴达人总是从一己爱欲和本邦利益着眼处理对外关系,那么斯巴达更会派出援军。因为他们拥有米洛斯的信任和忠诚,如果坐视米洛斯被灭,这将有损于他们在希腊世界的政治声望,并最终损害其利益。<sup>②</sup> 米洛斯人还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为雅典人指出斯巴达人可能的援助行动,那就是派遣善于海战的斯巴达盟友前来、进攻雅典帝国的国土、攻击雅典的盟邦。米洛斯人认为这将会迫使雅典人撤军回师。然而雅典人告诫他的听众,雅典从未因为害怕别人进攻本土而后撤。<sup>③</sup> 继而雅典人又一次申饬道:“你们把保全城邦安全的信心建立在希望和未来变故之上……因为虚荣心而误入迷途……那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不卑不亢地善待地位平等者,卑躬屈膝地奉承地位优越者,温文尔雅地对待地位低贱者,这些全都是最成功的处世之道……你们只有这一个城邦,它的繁荣或是毁灭,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决定。”

然而米洛斯人坚持原有的立场,做出最终的答复,他们将坚持守护“长达700年之久的城邦自由”,寄望于“神灵的庇护”和血亲的“援助”,并将尽力保卫城邦安全。雅典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希望彻底落空,在离开谈判会场之前,他们向米洛斯人发出了最后的申饬:“你们终将彻底失望。”

雅典人并非危言耸听。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谈判失败的雅典人紧接着就开始对米洛斯城邦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米洛斯人曾经趁夜色对雅典人发起小规模攻击,但无关大局;他们没有等来斯巴达的援兵,实际上拉栖代梦人甚至没有考虑要援助他们;他们也没有得到神灵的佑护: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一年之后,在经历了颇为激烈的围城战之后,由于内部出现分裂与背叛,米洛斯人无条件投降,雅典大军进入城中,将所有的成年男子尽数屠戮,将女人和孩子全部卖为奴隶。米洛斯岛被彻底夷平,成为雅

① 雅典人告诫米洛斯人,斯巴达人素来“把他们所爱做的事视为光荣的事,把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视为正义之事”。

② 米洛斯人认为,如果坐视米洛斯被攻陷,斯巴达就会“失去他们在希腊的朋友的信任,会有利于他们的敌人”。

③ 这暗示的乃是雅典在对抗波斯大军时不惜放弃整个雅典城市,而全军登船入海,任由波斯人放火焚毁雅典城的历史。那最终为雅典赢得了莫大的光荣,并成为日后雅典帝国的最初缘由。参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79—583页。

典人新建的殖民地。<sup>①</sup>

在修昔底德的史著中,这段雅典与米洛斯人的对话素来被认为最能彰显雅典的帝国主义特质。对话中双方关于国际正义与实力、权势、利益等相互关系上截然对立的观点,鲜明地展示了在这场大战进行到最高潮之际雅典人关于帝国、强权的认知与看法。然而,我们认为,饶有意义的不仅仅是直接去关注雅典人在对话中肯定了什么,还要去关注他们否定了什么,尤其是否定了他们自己曾经肯定过的某些原则性的主题。

谈判甫一开始,雅典人就直接讲道:“我们不愿用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影响你们,说因为我们推翻了波斯人的统治,我们有权维护我们帝国的利益,或者说现在进攻你们,是因为你们使我们受到损害。同样,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想说这些来影响我们,比如说,你们尽管是拉栖代梦人的移民,但没有参加拉栖代梦人的同盟,或者说你们并没有对我们造成损害。”在这里,雅典人否定了两大内容:一是基于历史业绩而获得现实尊崇的权利;二是出于过去的利害得失而产生的对现在行动的限制。在雅典人看来,这些都“似是而非”,并不能算是雅典帝国行为的根本理由。接着,雅典人否定了弱小城邦自由与中立的可能以及它们对自由的坚守和与外来强权之奴役相抗争的权利:“(强大城邦)保持独立,只是因为它们强大,我们未进攻它们,只是因为畏惧……你们是更为羸弱的岛民,无法抗衡海上霸主的进攻”;“你们的友好,是我们软弱的证据;你们的仇视,是我们强大的证明”;“你们屈服,就可免遭灭顶之灾”。并且,雅典人还否定了弱者在战争中可能遇到的“命运”垂青与神灵佑护,从而彻底消除了毫无实力基础的弱者对战争偶然性的希望:“希望,不过是危难中的自我安慰”,神的法则并非保护弱者,而是扩张强权。最后,雅典将弱者抗衡强权、保全自由的行为斥为“虚荣”,那将“带来毁灭性灾难……是一种愚蠢”,而真正的光荣则是“向希腊最强的城邦屈服”。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米洛斯城下的雅典人完全否认了在人类事务中弱者保全自由的可能,完全否认了弱者反对奴役的意义,他们拒绝给帝国暴力添加任何限制,并对帝国的暴力行动充满了无以名之的自信,甚至把暴力本身当作信仰。对修昔底德“记述”中的这些雅典人,希腊人狄奥尼索斯(Dionysius)觉得,“(这些言辞)完全是东方君主式的口吻,没有一个希腊人会如此说话”。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则在狄奥尼索斯的质疑之后加上了这样一个条件:“除非讲话者

<sup>①</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307.

失去了理智：他疯了。”<sup>①</sup>在他看来，雅典发言者这种超出了“狄奥尼索斯所认知的正常希腊人心智”的“特殊疯狂”，“展示了一个城邦的特殊病症，希腊人称之为‘病态’。它呈现出傲慢和盲目两种表现；傲慢又包含两种相互区别又紧密相连的疯狂的兴奋，一种是精神旺盛的、满怀以往的因胜利而得意扬扬的兴奋，它以‘希望’为生，与不可控制的‘欲望’手牵着手；另一种是自以为是的、戴面具的、愤世嫉俗的、目中无神的、对自己的世俗智慧充满自负的兴奋。前一种类型我们不久就会碰到（即雅典对西西里的远征），后一种类型在米洛斯对话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两种类型又都是盲目的：一个兴高采烈地朝着毁灭加速前进，另一个则无视神的复仇”。<sup>②</sup> 美国古典学者史蒂文·福德(Steven Forde)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与米洛斯人的对话是雅典帝国野蛮化的缩影。”他接着指出，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立场，至少可以追溯到伯利克里时代，战争开始之前，它的基础便可以在雅典人关于权力与统治的原生性主题中清晰可见。雅典帝国的实力和威胁依赖于雅典人大胆的特性，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夸耀城邦时期的立场，与后来他们对米洛斯人的立场没有明显不同。<sup>③</sup> 在另一处，福德重申：“雅典人灵魂深处对勇气和荣誉的渴求刺激了雅典帝国的扩张。”<sup>④</sup>然而他的话过头了。米洛斯城下的雅典人在追逐帝国权势的道路上确实已经疯狂，但这种疯狂并不直接根源于雅典人的人格特性。雅典人曾经也像狄奥尼索斯所熟知的那种希腊人一样，拥有正常的希腊心智，恪守正义，崇尚自由，敬畏神灵，反对奴役，节制武力，审慎从事。从狄奥尼索斯所认知的正常雅典人到米洛斯城下的狂暴雅典人，整个雅典帝国连同其民众经历了极其显著的蜕变。

### 三 言辞与事行：蠡测雅典帝国的蜕变

事行乃实际发生的行为，言辞则是事行的成因，与事行密不可分。而有些东西，诸如言说的机智、措辞的优雅、高贵的坦诚与无耻的坦诚以及最为重要的智慧等，这些本质上属于言辞成分的德行和恶行，则只能借由言辞才能被揭示出来。<sup>⑤</sup> 通过考察雅典

---

①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182.

②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p.182-183.

③ Steven Forde, *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 pp.26-27.

④ Steven Forde,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Athenian Imperia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0, No.2, 1986, pp.433-448.

⑤ Leo Strauss, “Thucydides: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History,” in Thomas Lee Pangle, ed.,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Leo Straus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92-93.

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的事行与言辞,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雅典帝国所经历的那种从审慎节制的仁慈帝国向狂暴蛮横的专制帝国的明显蜕变。

最早(约 483B.C.) ,在波斯帝国的薛西斯(Xerxes I)大举入侵之前,雅典人在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劝说下,缔造了后来希腊世界对抗波斯大军最核心的海上力量。<sup>①</sup> 随着战争的发展,雅典人凭借勇敢,在海上屡挫强敌,并最终在萨拉米海战(the Battle of Salamis,约 480B.C.)中决定性击败波斯海军。<sup>②</sup> 此时,雅典人已经在战争中赢得了他们在希腊世界的权势地位,希罗多德(Herodotus)在 60 多年后总结道:“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这是十分中肯的说法。雅典人站到哪一方,优势就会转到那一方。”<sup>③</sup> 随后,波斯统帅马多尼乌斯(Mardonius)以高爵重金诱使雅典人倒戈。然而面对 30 万波斯大军和紧随其后的薛西斯更大规模的波斯舰队,雅典人宣布: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那么多的黄金,有那样美好肥沃的土地足以买动我们的欢心来站到波斯人的方面奴役希腊。我们诸神的神像和神殿被摧毁,我们必须复仇;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有亲属关系,在祀神礼仪、生活习惯方面相通;背叛希腊、投靠波斯是很不妥当的。雅典人正告强大的波斯人:“只要还有一个雅典人活着,我们就绝不会和薛西斯缔结协定。”<sup>④</sup> 他们甚至还指着太阳宣誓:“只要日球还保持在运行的轨道上面,只要希腊的国土还受到蹂躏,寺庙受到亵渎和焚毁,雅典人与波斯人的战事就绝不会停止。诸神和天上的英雄也会帮助我们。”<sup>⑤</sup> 面对波斯大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与杀戮,雅典人寄望于神佑,寄望于破釜沉舟式的抗争,并借由雅典勇士的不断胜利产生出赢得战争的希望。这个时候,雅典否认弱者依附强者乃是合理的选择,否认金钱财富能够换取忠诚正义。这个时候,雅典唯一瞩望的乃是希腊世界的整体自由。反对奴役、反抗暴力、无惧强蛮、敬畏神灵是他们最鲜明的气质。

此后,因为斯巴达的保守,也因为雅典人尤其是雅典海军及其将领在抗击波斯战争中的深孚人望,希腊世界赋予雅典以领袖地位,由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the Delian

<sup>①</sup> 当波斯帝国的薛西斯倾全国之力对希腊世界采取进攻行动时,斯巴达尚未采取有效的应对。而雅典人则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劝说之下,将他们从劳里昂(Laurium)的银矿罢工中收获意外之财——100 塔兰特(Talents)白银用于建造 200 艘战船,这成为后来整个希腊世界对抗波斯大军的最核心的海上力量。随着波斯大军的深入,雅典与斯巴达成为整个希腊世界对抗波斯帝国的中坚力量。面对数量众多的波斯陆军,斯巴达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而雅典人则放弃了城邦土地,只凭借海军势力,屡挫强敌。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 520—521、576 页。

<sup>②</sup> 希罗多德:《历史》,第 587—598 页。

<sup>③</sup> 希罗多德:《历史》,第 517—518 页。

<sup>④</sup> 斯巴达担心波斯的劝降会改变雅典的政策,这是雅典人在波斯使者在场的情况下对斯巴达来使的表态。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 619—621 页。

<sup>⑤</sup> 这是雅典人对波斯使者的直接回复。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 620 页;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版,第 599 页。

League)成立。<sup>①</sup> 年轻的雅典将领西蒙(Cimon)成为同盟舰队的统帅,开始对波斯发动猛烈的进攻,同时也不断攻击那些拒绝加入或者想要叛离同盟的城邦。随着战事的发展,雅典所承担的兵役越来越重,对盟国缴纳贡赋和提供舰船数量的要求也越来越大,相比之下,盟邦则因为兵役负担越来越轻,兵员素质越来越低,战斗力越来越弱。同盟中其他城邦对雅典的安全依赖越来越严重,而雅典对各个城邦的干涉也越来越普遍,控制越来越严密。整个同盟逐渐演变为以雅典为核心的联邦帝国。<sup>②</sup>

25年后(451B.C.),西蒙在塞浦路斯岛击败波斯人,长达50年的希波战争基本结束。雅典控制下的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开始面临重大危局。同盟内的诸邦开始质疑同盟存在的必要,并且不满于雅典对它们越来越频繁和无度的资源榨取与内政干预;位于波奥蒂亚(Boiotia)的一些盟邦开始反叛,并击败了一支用于平叛的雅典军队;主要的谷物产地且对雅典海上交通线具有重要意义的优卑亚岛(Euboea)随即起义;盟邦麦加拉(Megara)也将矛头对准了雅典;斯巴达则越来越担心雅典的进一步壮大将会危及它在希腊世界的权势地位,准备入侵阿提卡(Attica)地区。尽管雅典在伯利克里的领导下很快消除了来自同盟的内部威胁,并尽量避免与斯巴达的正面纠缠,但它明显强化了对盟邦的掌控。这个时候,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变得像一个首府城邦,以前爱琴海地区的独立城邦则被它降为区域中心。盟邦的贡赋实际上是他们支付的保护费。在有革命的时候,雅典就接管反叛城邦的财政管理事宜,派驻守军和官员,或者将土地没收并重新分配给雅典公民。雅典不与相关城邦商议,自行决定外交政策,还坚持让所有人都使用雅典的度、量、衡、钱币。主要的案件都在雅典审判,即便犯罪行为是在国外做下的”。<sup>③</sup> 这个时候,雅典尽量“对蛮族的国王和酋长展示自己权势极其强大,有绝对的信心和能力,可以航向任何想去的地方,把全

<sup>①</sup> 大约公元前477年,雅典人阿里斯泰德斯(Aristides)提出了一项得到大多数希腊城邦欢迎的远征波斯的战争计划:由于维系一支常备舰队的耗费远非任何一个城邦所能承担,所以,在某些城邦特别是雅典可以提供船只和人力时,一些更小的城邦可以贡献钱财。于是,由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成立,其中小城邦出资,购买廉价的安全;大城邦出力,收取舰队补助金。参见伊恩·莫里斯、巴里·鲍威尔著,陈恒等译:《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4—356页。修昔底德也有简要描述,参见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48。

<sup>②</sup> 在抗击波斯的同时,雅典(及其控制下的提洛同盟)通过大力支持埃及的反波斯起义,从而将权势扩展至彼处;修筑连接雅典卫城与其海港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长墙”以增强其出海通道的绝对安全,从而无惧敌国在陆上的任何行动可能引起的雅典物资短缺;击败怀有敌意的希腊世界第三强科林斯人,从而大大削弱了由斯巴达领导的、意在遏制雅典权势的伯罗奔尼撒同盟(the Peloponnesian League)。对这一历程的概述可参见伊恩·莫里斯、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358—361页。

<sup>③</sup> 伊恩·莫里斯、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361页。

部海洋置于控制之下”。<sup>①</sup> 同时,伯利克里“抑制雅典人征服外国的激情,用严苛的手段打消人们那些开疆辟土过于一厢情愿的念头,要求大家把大部分力量用于保护和巩固已经到手的东西”。<sup>②</sup> 这个时候,雅典帝国权力稳定,权势臻至顶峰,但高度节制武力,从伯利克里巩固其雅典领袖地位之后(约 446B.C.)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431B.C.),雅典唯一一次大的战事就是粉碎萨摩斯岛(Samos)上的起义(440B.C.-439B.C.)。<sup>③</sup>

从公元前 435 年开始,雅典卷入了科林斯(Corinth)和科西拉(Corcyra)两大城邦之间的纷争之中。雅典支持后者,并多次击败科林斯的进攻。于是科林斯人前往斯巴达求援(431B.C.)。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人指责雅典人侵略成性,野心勃勃,奴役他国,呼吁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对雅典宣战。恰好在斯巴达公干的雅典使者获准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这就是修昔底德著作中第一篇雅典人关于帝国的言辞记录。<sup>④</sup> 演说一开始,雅典人诉诸往昔,大谈特谈雅典帝国的历史来由。在他们看来,雅典在对抗波斯的大战中承担了巨大的危险,最后依赖强大的海军和最忠诚的希腊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雅典帝国乃是由“这种光荣而带来的利益”;并且,雅典帝国并非雅典人凭借武力刻意谋求的政治成果,而是在对抗波斯时希腊诸邦邀请而来的同盟领袖。<sup>⑤</sup> 据此,雅典人暗示,他们的帝国具有天然的历史合法性,同为强邦的斯巴达无权肆意剥夺。接着,雅典人诉诸现实。随着在希腊世界中权势的增强,雅典越来越被同盟内外的城邦所嫉恨,维系帝国、强化统治,已经变成雅典确保自身安全的必需。<sup>⑥</sup> 雅典人相信,久居希腊霸主地位的斯巴达人一定懂得这个道理。雅典人坦陈,恐惧、荣誉和利益乃是维系帝国的最强大的三个动机,但他们尤其强调“被卷入一个很大的危险之中,并不能说他是唯利是图”。在这里,雅典人否认了那种只基于利益考量而无视其他缘由的暴力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同时,他们辩称,在雅典的帝国秩序中,雅典对其他城邦乃是依靠公认的符合普遍利益和正义要求的法律进行治理,而不是直接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显然,雅典人“并不否认帝国是非正义的……但认为值得称赞的是那些尽可能正义地行使非正义统治的人;要避免行使这一

<sup>①</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305 页。

<sup>②</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306 页。

<sup>③</sup> 伊恩·莫里斯、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 362 页。

<sup>④</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36-40.本段下引言辞,如非另外注明,均来自雅典人的此次演说。

<sup>⑤</sup> 雅典人强调:“这个帝国不是我们以暴力的手段获得的,而是由于你们不愿意和异邦人作战到底,同盟者自愿到我们这儿来,请求我们为他们的领导者而获得的。”

<sup>⑥</sup> 雅典人坦言:“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并招致普遍的反感时……放弃帝国就不再安全了……事物发展的实际过程迫使我们增加实力,达到现在的程度。”

统治则是不可能的”。<sup>①</sup>由此，雅典人努力将他们的帝国描述成一个仁慈的、节制武力的开明帝国。这样的帝国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仇视。最后，雅典人不忘提醒同样兵威强大的斯巴达人，战争充满偶然与未知，一旦开战，就会不可预料，超出人的控制，因此务必要小心谨慎。这个时候，强大的雅典人在言辞中保持着必要的审慎以及对未知命运的基本敬畏。

雅典人的演说并未能够消除斯巴达人意欲发动战争的愤怒。这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在两大城邦之间爆发。战争开始之前，作为统帅的伯利克里为雅典谋划了详尽可行的取胜方略。在对公民的演说中，<sup>②</sup>伯利克里表达了对打赢战争的足够的乐观，同时也保持了与雅典使者相似的审慎。他回顾雅典人的历史荣光，宣告“最大的光荣来自最大的危险”，他鼓励雅典人“大有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但也告诫他们，雅典帝国的荣耀来自父辈们的贤智而非幸运、勇敢而非实力，要严防战争扩大，保持必要谨慎。<sup>③</sup>这个时候，伯利克里赞同甚至鼓动雅典帝国对伯罗奔尼撒世界的暴力对抗，但严格限制了这种暴力实施的方式和运用的范畴。节制，堪称伯利克里为雅典帝国的对外暴力规定的最根本的底线。

不久之后，在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上，<sup>④</sup>伯利克里全面回顾了雅典帝国截至那时的伟大特性。他首先歌颂了雅典人的先祖的荣耀：勇敢无畏以维护自由，奉献牺牲以成就帝国。接着，他提醒雅典人的特性乃是推崇公正，享受自由，热衷公共事务而敬畏法律；重视辩论，遇事审慎；<sup>⑤</sup>慷慨大方，施惠他人。<sup>⑥</sup>他把雅典描绘为“全希腊的学校”，在这个学校中，雅典人向全希腊展示何谓“光荣”：为维护城邦自由而勇敢地战斗甚至不惜牺牲的人乃是最大的光荣。<sup>⑦</sup>最后，他鼓励所有的人为祖国荣誉而战，他告诫：“只有对荣誉的热爱是永恒的，使一颗年老而不幸的心得到快慰的，是荣誉，而不

<sup>①</sup> Clifford Orwin, “Justifying Empire: The Speech of the Athenians at Sparta and the Problem of Justice in Thucydid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48, No.1, 1986, pp.77–78.

<sup>②</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68–72.本段所引言辞，如非另外注明，均出自伯利克里的这段演说。

<sup>③</sup> 伯利克里提醒雅典人，“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敌人的诡计，而是自己的失策”，“不要再利用战争来实施新的征服扩张计划，不要主动地把自己牵入新的危险之中”。

<sup>④</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90–96.本段下引言辞，如非另外注明，均出自伯利克里的演说。

<sup>⑤</sup> 伯利克里称赞雅典人，“在从事冒险事业之前或冒险事业之中，能够对它深思熟虑”。

<sup>⑥</sup> 伯利克里提醒，雅典人“结交朋友旨在给他人好处，而不是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只有雅典人，他们在施惠于别人时从不计较利益得失，而是出于一种慷慨大度的信念”。

<sup>⑦</sup> 伯利克里勾画了这样一种光荣的雅典人形象，他们“认为向敌人复仇是最光荣的冒险……他们快乐地决定参加对敌复仇，坚信能够击溃敌人，而放弃了别的一切。他们并没有对难以确定的最后胜利寄予厚望，而是在面临的实际战斗中，勇往直前，相信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宁愿在抵抗中牺牲，也不愿在屈服中偷生；他们没有做不光彩之事，他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阵地；霎时间，在他们命运的顶点，不是恐惧的顶点，而是光荣的顶点”。

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利益。”在这个演说中,伯利克里意在激发雅典公民的战斗精神和冒险勇气,并将这种勇气引到维护雅典帝国的安全和荣耀上面。他着重论述了雅典城邦与个体公民之间荣耀与利益的一致性,并格外突出了荣耀的分量。在他看来,荣耀高于利益,无论是城邦的还是个人的,都是如此,而个人的荣耀只来自对城邦荣耀和利益的保卫事业中。由此,伯利克里营造了一种他那个时代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雅典帝国(抑或城邦)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不过,在演说中他似乎刻意回避了帝国雅典和城邦雅典在自由方面的矛盾,以至于其说辞竟与历史上那些在外敌入侵兵临城下之际的政治家演说毫无二致。当然,伯利克里意在通过演说安抚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同时鼓励雅典公民努力投入大战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建构似乎理所当然,但他在演说中对自由的推崇和为维护这种自由而甘于牺牲的呼吁仍然值得高度重视。雅典人认为伯利克里的这篇演说最为精彩,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因为他关于自由的获得与维系之论述深孚其心。这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此时的伯利克里拥有雅典政治家的首辅地位近40年,而成功驱逐政敌修昔底德后,他已经连续独自掌握雅典军政大权10余年。<sup>①</sup>他的演说大概会有他在过去多少年中意欲引导雅典民众应该怎样的那种理想,同时也必然会映射出当时雅典及其民众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推崇荣耀、崇尚自由、深思熟虑、自信自豪,这可算作这个时期伯利克里通过演说勾勒出来的雅典帝国形象。

然而很快,伯利克里的雅典及其帝国民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变得重视利益远胜过重视荣耀,推崇暴力远胜过推崇自由,意气用事远胜过深谋远虑,怀疑一切远胜过克制谨慎。他们变得暴躁、残忍、短视,并且锱铢必报。这一点在战争第四年雅典人处理密提林(Mytilene)叛乱的问题上体现得很清楚。

密提林是列斯堡岛(Lesbos)上的重要城邦,原本是雅典盟邦,后来该城内的寡头派在斯巴达的怂恿下密谋背叛雅典,但经过混战之后,亲雅典的民主派夺回了权力,并将叛乱的寡头送往雅典处置。雅典人对密提林的背叛愤怒异常,遂决定实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残酷决议:要处死密提林所有成年男子,把妇女和未成年男女都变为奴隶,既要杀戮那些有罪的叛逆,也要严惩这个邦国其他无罪的全部人民。<sup>②</sup>最初动员雅典人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当时“对人民有很大影响”的克里昂(Cleon)。在公民大会的演说中,<sup>③</sup>他推测,密提林的背叛乃是一项有计划、有预谋的侵略行动,旨在联合雅典的敌

<sup>①</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01—302页。

<sup>②</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45.

<sup>③</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146—149.本段所引言辞,如无另外注明,均为克里昂的演说词。

人一同毁灭雅典。这表明雅典帝国的臣民都是一些心怀不满的谋反者，整个帝国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警告，臣属的忠顺并不可靠，帝国的让步将无异于自杀。赦免密提林人将会诱发雅典属邦的叛乱之心，从而既削弱雅典帝国的财政来源，也将直接陷帝国于连续作战、消灭叛乱的危险境地。因此，要保持安全，就必须震慑臣民，必须对臣属展示强大的武力。克里昂提醒雅典民众，帝国主义政治的逻辑就是“尊重产生傲慢，强硬导致敬畏”，同情心、感情用事、宽大为怀乃是帝国最为致命的三个弱点。要维护帝国的统治，就必须严格按照帝国的利益要求，以暴制暴，以强大的武力、残忍的行动昭示“暴动者必须死”这一帝国教训，震慑那些潜在的叛逆者。在克里昂看来，威慑、报复、惩罚乃是雅典帝国处理与臣属各邦关系时最根本的准则。他竭力营造一种帝国已经深陷危局的氛围，怀疑一切非由雅典暴力威压换来的臣服，彻底否定帝国进行“仁慈”统治的可能，“要么根据帝国利益，实施严厉的惩罚；要么放弃帝国统治，博取仁慈的美名”。克里昂的这套说辞最初被雅典人全部接受，他们不顾密提林的萨莱苏斯(Salaethus)主动提出的帮助雅典人解除伯罗奔尼撒人对普拉提亚重围的好意，马上处死了他；他们群情激愤，决定对密提林人实施严酷的惩罚。

不过雅典人狄奥多图斯(Diodotus)坚决反对克里昂恐怖的提议。<sup>①</sup>他告诫雅典人，切勿匆忙，切勿愤怒，因为它们“是阻碍深思熟虑的两个最大的障碍，匆忙常常与愚笨联系在一起，而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他从雅典帝国长远的利益出发，本着最实用的态度指斥克里昂的言辞“似是而非”。他提醒，在帝国政治中，出于冲动、激情、贪欲、幸运引发的希望，叛逆行为将恒常出现；对密提林人的残酷处置将会引发普遍恐惧，从而强化那些叛逆城邦的抵抗决心，增大雅典的镇压困难；并且因为它们拒不投降，雅典将失去本可能从它们那里重新获得的财政贡赋，这会从根本上削弱帝国的军事能力。他提醒，维护帝国的安全，不能仅仅凭借恐怖的暴力，而应该在臣属叛离之前强化监视，杜绝他们叛逆的念想；对待叛逆，应当节制武力，使尽可能少的人承担罪罚。他提出忠告，“对于保全帝国最有利的是宁可让人家对不住我们，不要把那些活着对我们有利的人统统处死”，“审判并惩罚那些密提林战俘，而对其他无辜的人保持现状，对帝国的将来有利……是雅典最英明的决定”。

在修昔底德记述的这段辩论中，作为雅典“最暴虐的公民”，<sup>②</sup>克里昂关于仅仅依靠暴力增进帝国安全的宣讲几乎颠覆了此前所有雅典人在帝国问题上的言辞，更与伯利克里关于节制武力的不断告诫大相径庭，我们完全可以并非不合理地断定，这位出

<sup>①</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150–153. 本段所引言辞，如无另外注明，均为狄奥多图斯的演说辞。

<sup>②</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46.

身贫贱、凭借机智的应变和大胆的谈吐赢得雅典人的爱戴、拥有显赫声望和巨大权力的执政官,<sup>①</sup>几乎已经成功地将“暴力”推崇为雅典人最崇尚的帝国要素,从而完全挣脱了伯利克里为雅典的帝国武力所设定的必要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对话中的狄奥多图斯是一个奇特的存在,除了与克里昂关于密提林问题的辩论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然而他的言辞却同样折射出这个时候雅典最突出的帝国逻辑。他在演说中根本不提雅典从抗击波斯以来就始终未曾公开抛弃过的通行于希腊世界的正义、公正问题,而只是从雅典的帝国利益考虑对密提林叛乱的处置,“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使密提林人对雅典最为有利的问题”;<sup>②</sup>他甚至并不否认对密提林采取恐怖的惩罚是“正义”之举,“现在世界各邦对于许多不如此事这么严重的罪犯都处以死刑”,只是这种“正义”实在无益于雅典帝国。如果说克里昂意在将残忍复仇的“正义”与帝国的利益融为一体的话,狄奥多图斯则力证帝国的利益高于希腊的“正义”。从而,他的言辞几乎可算作雅典人第一次如此直接和赤裸裸地单独推崇帝国统治中的“利益”要素。虽然有论者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狄奥多图斯做到了什么(使密提林人免于屠杀,并使雅典免于后来在米洛斯出现的那种暴虐<sup>③</sup>),而不仅仅是关注他说了什么(那可能是他必要的政治修辞术<sup>④</sup>)。事实是,在雅典人就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的提议进行表决时,尽管后者被通过,但双方票数几乎相同。这意味着这个时候的雅典帝国,一半左右的公民赞同利益至上的处理方略,而另一半则热衷于对外展示强大的帝国暴力。在执行决议之时,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密提林被处死的被认为应对叛乱负责的人数达到了1000人以上;本来用于维护其自由和安全的城墙被拆毁;舰船全部被雅典没收;列斯堡岛上大部分土地被剥夺,重新分配给了雅典移民;大陆上属于密提林的城镇被雅典人获取;密提林人从此彻底沦为雅典的臣民。我们可以发现,在处理密提林的言辞和事行中,雅典帝国的暴力与利益算计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唯独无视他们曾经奉为神物的自由、审慎与荣耀。维克多·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就此点评道,“丧命的密提林人数量等于雅典在第力安战役(the Battle of Delium)<sup>⑤</sup>中损失的所有重装步兵……一举消灭了密提林贵族阶层”,他不忘引述修

<sup>①</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43—948页。

<sup>②</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51.

<sup>③</sup>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p.231–236.

<sup>④</sup> 约翰逊著,彭磊译:《重思狄奥多图斯的辩论》,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53页。

<sup>⑤</sup> 大约公元前424年末,雅典人在第力安与波奥提亚人展开了大规模的陆军会战,雅典人大败,损失了数以千计的陆军精英,残众溃逃,被敌方追击屠杀。此战是雅典自马拉松战役(490B.C.)之后首次在阿提卡边界地区的陆上会战,深深震撼了雅典帝国。参见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232–239。

昔底德对自己国人的透彻评论——“野蛮( *ōmon* )”。<sup>①</sup>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事隔一年(战争第六年),雅典人首次进攻海洋中的中立岛邦米洛斯,伯利克里那“不实施新的征服计划”的警告被抛诸脑后,帝国的“克制”成为过往。战争第七年,在派娄斯( Pylos ),陷入困境的斯巴达人以优厚的条件向雅典求和,克里昂鼓动雅典人,“既然已经大局在握,便随时可以缔结合约,并谋取更多的利益”,从而不无傲慢地拒绝了斯巴达人的温和条件,致使雅典对斯巴达的围攻又持续了两个多月,在大费人力物力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小的失败风险,<sup>②</sup>从而确证“深思熟虑”在帝国已难觅其踪,甚至“利益算计”也已为“贪婪无度”所取代。战争第八年,雅典入侵波奥提亚( Boeotia ),以战争“必需”为说辞,打破“希腊人都遵守的惯例”,侵入波奥提亚神庙,汲取那里的圣水用作寻常的用途。他们宣称“在战争和压力下所做的事情,神明也会宽恕”,从而使“必需”战胜了“虔敬”,将雅典的暴力彻底从神性和希腊通行惯例的限制中放纵出来。<sup>③</sup> 战争第十年,雅典成功摧毁了于两年前倒戈背叛的塞翁尼城( Scione ),这一次,克里昂当初对密提林的惩处提议得到了彻底执行:所有成年男子均被处死,妇女和儿童被贩卖为奴隶,土地和城镇被转交给战争初期被斯巴达夷灭了城邦的、流浪的普拉提亚人,塞翁尼作为一个城邦从此不复存在。<sup>④</sup> 如果雅典人对密提林的处置是“野蛮”的话,那么他们对塞翁尼的处置就得用“极度野蛮”来形容,而战争第十七年雅典人二次围攻米洛斯,并像处置塞翁尼一样处置米洛斯人,其言辞推崇暴力,无视正义,嘲弄自由,亵渎神性,其事行残忍无度,暴虐恣肆,则只能用“无以复加的野蛮”来形容了。雅典帝国的狂暴蛮横终于臻于顶峰。此后雅典远征西西里、处死六将军<sup>⑤</sup>等,都可看作这种帝国狂暴蛮横特质的自然延伸,直到被斯巴达的莱山得( Lysander )在羊河绝杀( 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 ),彻底战败。

固然,雅典帝国的上述残暴言行大部分都与当时的执政者或者指挥官有关:抛弃

<sup>①</sup>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6, p.106. 该书中译本请参阅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著,时殷弘译:《独一无二的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sup>②</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198–199, pp.201–209.

<sup>③</sup> 关于雅典人在波奥提亚侵入神庙一事的深层含义,可参阅 Clifford Orwin, “Piety, Justice, and the Necessities of War: Thucydides' Delian Debate,” pp.233–239.

<sup>④</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273–274.

<sup>⑤</sup> 公元前 406 年,10 位雅典将军指挥海军打了一场胜仗(阿吉努赛海战, the Battle of Arginusae ),然而,公民大会指控他们中的 8 位不必要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并且没有打捞阵亡者的尸体。愤怒的民众最后判处 8 人有罪,其中 6 位被处死,包括伯利克里的继承人小伯利克里。参见色诺芬著,徐松岩译注:《希腊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35—46 页;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322 页。

了伯利克里的审慎与节制而高度赞扬帝国暴力的是克里昂，波奥提亚的渎神行径出于雅典当时的战场指挥官，夷灭米洛斯的主张乃至后来倾全力远征西西里也是由于亚西比得(Alcibiades)的鼓动。<sup>①</sup> 修昔底德评述道，“他们都想谋得政治的首要地位……他们忙于施展个人阴谋，以图对民众的领导权，于是导致了远征军的失败和帝国的内乱”。<sup>②</sup> 普鲁塔克(Plutarch)则提供证明，伯利克里之后对雅典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克里昂和亚西比得，克里昂毫无修养，<sup>③</sup> 他对暴力的极度鼓吹乃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邪恶，以便继续从事欺诈的政治骗术”；<sup>④</sup> 而亚西比得则充满野心，“雅典脱离正轨陷入一切混乱，都是其野心作祟。他使雅典充满狂暴和愤怒的气氛，再度牵连到比过去的局势更为恶劣的战争之中”。<sup>⑤</sup> 唯一被认为能够在伯利克里之后对僭越和粗暴的克里昂(也必然包括后来取代克里昂的亚西比得)发挥阻遏作用的尼西阿斯(Nicias)，<sup>⑥</sup> 尽管没有任何的欺骗、偏颇和专权行为，却禀赋不足，<sup>⑦</sup> 缺乏机智能力和雄辩才华，只能用“戏剧演出、体育竞赛和其他展示活动来娱乐大众”。<sup>⑧</sup> 似乎这两位经典作家想提醒读者，拙劣的政治领导乃是雅典帝国因残暴而覆灭的重要缘由。

然而事实上，雅典的残暴绝非几个政治领袖的问题。修昔底德与普鲁塔克均提到，克里昂与亚西比得的政治阴谋乃是通过“赢得民众的赞同”而谋取政治权势，这暗示雅典帝国残暴行径的真正责任人乃是雅典投票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证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雅典人直接管理政府。<sup>⑨</sup> 因而，要在帝国政治中谋得声望，就必须使多数人满意。尼西阿斯发现，“公民大会利用那些才华出众和能力高强的人士，对这些人的长处和优点抱着猜忌的心理，用警觉的眼光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找到机会就要挫折他们的锐气和贬损他们的名声”。<sup>⑩</sup> 可见，雅典的公民大会对帝国事业拥有最

<sup>①</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57—367页。

<sup>②</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06.

<sup>③</sup> 克里昂大胆狂妄而不受约束，废弃公开演说应有的礼仪，让这种风气传播开来，让那些负责国家政务的人将肆意任性和傲慢无礼视为正当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51页。

<sup>④</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52页。

<sup>⑤</sup> 亚西比得是一个“放荡的浪子，根本不受世俗礼法的约束”，他“天性喜欢趋向极端，充满强烈的激进思想”。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439,952页。

<sup>⑥</sup> 尼西阿斯在伯利克里死后很快被拔擢到最高的职位，除了他的出身、品性、功业之外，还因为富有和显赫的公民对他怀有好感，希望他能够阻遏克里昂的僭越与粗暴。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43页。

<sup>⑦</sup> 对尼西阿斯，普鲁塔克的评价是“怯懦，欠缺男子汉的气概，这使得他对最卑贱的民众还要百依百顺”。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013页。

<sup>⑧</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44页。

<sup>⑨</sup> 亚里士多德提到，战争爆发后，雅典人民“关在城里，惯于靠着他们服兵役的所得以谋生。于是一部分出自他们自己的意志，一部分也出自违反他们意志，他们决定亲自管理政府了”。参见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6页。

<sup>⑩</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48页。

高的和最后的决定权。这种情况持续于整个战争期间。<sup>①</sup> 因此,汉森尖锐地剖析道:“雅典的帝国狂暴并非由胡作非为的将军们主使,而是由雅典公民自己的多数票驱动。”<sup>②</sup>换言之,雅典帝国的狂暴本质上是因为雅典公民变狂暴了。作为整个帝国的首府,城邦雅典已经陷入巨大的狂暴蛮横之中。修昔底德就此注解道:“雅典的繁盛使他们认为:无论何事,他们都能顺利达成;凭借强大的兵威,无论难事易事都不成问题;凡是他们想要的,他们都有力量拿到。”<sup>③</sup>弗朗西斯·康福德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在屠灭米洛斯和远征西西里之际,那正处于疯狂状态、被利益和鲜血蒙住双眼的,并不是大肆鼓动远征以谋求利益的亚西比得(他或许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想法,借以扩大自己的权势),而是整个雅典。<sup>④</sup> 随着帝国的拓展,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进,雅典民众彻底抛弃了他们的先祖曾经为之浴血奋斗的希腊自由与普遍正义,彻底抛弃了礼法、习俗与神性对他们暴力的限制,彻底背弃了他们自己订立出来的公正的法律,而将帝国的残暴和狭隘的私欲鼓吹为自然法则推崇到极致,将征服弱者和毁灭一切加冕为帝国荣耀。他们变得毫无顾忌,不可遏抑。终于,在屠灭米洛斯之后,他们开始了自伯利克里时期就极度渴望但受到严格压制的对西西里的远征事业。<sup>⑤</sup> 大军出发之前,剧作大师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似乎窥知了这个狂暴帝国的可怕命运,他的《特洛伊女郎》一剧在雅典首次上演。借海神波塞冬(Poseidon)之口,他向观众提出了无济于事的警告:尔等实在愚昧无知!尔等蹂躏城市,焚毁神庙,破坏墓地——彼乃尔等先祖安眠之圣殿!天命昭昭,尔等必遭暴毁!<sup>⑥</sup>

#### 四 蜕变根源:战争可怕的释放效应

那么雅典的蜕变根源何在?实际上,修昔底德最早注意到了蜕变的端倪,并且深刻地指出了蜕变的根由,他写道:“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之后,雅典人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战争和瘟疫立即给他们造成了沉重的压力。”<sup>⑦</sup>然而他并未直接、集中论述战争和瘟疫究竟如何促成并延续了雅典的蜕变。下文将就此予以详细的

① “只要局势还很均衡,他们就继续保持民主政治。”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38页。

②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185.

③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220.

④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187.

⑤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74页。

⑥ Euripides, *Trojan Women*, translated by Alan Shapir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

⑦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01.

剖析。

通观史料,我们可以确认,雅典投入其中的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性质、长度和烈度上均堪称希腊世界中的史无前例。

首先,这是一场希腊世界的普遍内战,迥异于希罗多德记述的对波斯的战争。后者乃是希腊世界反抗波斯这一外来入侵势力的大战,目的在于尽力维系希腊的生存与独立。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希腊世界内部各城邦普遍卷涉其中的战争,是雅典帝国与斯巴达领导的敌对同盟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雅典对帝国内部叛乱各邦的战争,目的在于赢得希腊世界的最高权势。如果说对波斯的战争使得雅典能够通过缔造一个“自由希腊”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汲取持久抗争的力量的话,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将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击得粉碎。对这场希腊内战中的雅典(包括其他希腊城邦)而言,希腊世界的共性毫无意义,各城邦的特性反而更值得关注:只有这些特性而非希腊共性,才能有助于各方在战争中清楚地辨识自我和他者,通过抬高自我,贬低他者,强化战争意志,坚定暴力决心。因此,这场内战一旦开打,几乎就意味着希腊世界自抗击波斯胜利之后确立的那些“惯例”将必然被无情地抛弃。

其次,就持续时间而言,尽管对波斯战争的时间更长(长达50年),但主要的战役都集中在几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约492B.C.-490B.C.,约480B.C.-477B.C.),尤其是西蒙取得反波斯同盟领导权后,希波战争的主动权几乎全部掌握在雅典手中,这使得雅典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调适对波斯的战争。所以虽然时间漫长,但战争间隙也较多,对雅典而言,战争压力仍可被消化。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近30年,其间除了《尼西阿斯和约》签订之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有过短暂的停战以外(只是和斯巴达的直接作战的中止,而与其他城邦的作战并未停止),几乎年年都在作战,雅典根本没有休战调整的机会。这意味着,对雅典帝国而言,伯罗奔尼撒战争乃是不折不扣的30年全面战争。这种经久战争的持续压力足以完全改变乃至彻底摧毁任何一个和平状态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社会政治系统。

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毁灭强度和野蛮程度远远超过了雅典所经历过的历次战争。一方面,据军事史学家的论述,在这场持续30年的内战中,雅典人(连同其他城邦)首次组织了正式的轻装部队,用于追击和蹂躏乡村。这些包含了月牙盾标枪兵、投石兵、弓箭手等兵种的“非常规”部队,以其装备轻便、队形散漫、长距杀敌,迥异于重装步兵军团那种充满纪律约束的方阵作战,在战争中大获其利。他们变得处处可见,对比早期希腊战争中全无杀害平民和极少杀害会战逃兵的重装步兵,他们“更像

现代叛乱者,以平民为打击目标”。<sup>①</sup> 他们最后几乎成为这场内战中历次陆上伤亡的主要创造者,<sup>②</sup> 迫使哪怕最为保守的斯巴达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新的作战方式,<sup>③</sup> 从而大大动摇了希腊城邦世界以重装步兵为基础的社会凝聚。<sup>④</sup> 另一方面,雅典所热衷的海军作战几乎耗尽了雅典的所有人力、财力和物力积蓄。与重装步兵的陆上会战和轻装部队的自由杀戮相比,雅典人擅长的这些海战包含了“在单独一场冲突中灭掉一个城邦的整支舰队和巨大投资的可能”。<sup>⑤</sup> 汉森简略地统计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夕和战争期间,除了西西里灾难之外,各场海战造成的毁伤数目大得惊人:希伯达(Sybota, 433B.C.), 300 艘战舰, 60000 名海员; 赛诺西马(Cynossema, 411B.C.), 162 艘战舰, 33000 名海员; 阿吉纽赛(Arginusae, 411B.C.), 263 艘战舰, 55000 名海员; 伊格斯伯塔米(Aegospotami, 404B.C.), 超过 300 艘战舰, 60000 名海员。而对西西里的远征失败,仅雅典一方就丧失了 216 艘战舰、45000 名人员和超过 3000 塔兰特的金钱、补给,相当于雅典帝国在自萨拉米战役后 50 多年中积累的全部财政。<sup>⑥</sup> 此外,在这场内战中,围城与屠杀成为普遍的常态。<sup>⑦</sup> 新的攻城战术和大规模屠杀人群的方式被发明出来,<sup>⑧</sup> 死于其中的人数已无可统计:仅雅典进攻波奥提亚一役,就损失了 1050 名战士;而在叙拉古围城战中,则有 45000 名雅典人及其盟友殒命战场;整个战争期间,史书中记载了逾 20 次大规模屠杀俘虏和无辜城镇居民的事件。单单公元前 427 年一年,平民就在科西拉、普拉提亚、密提林、小亚细亚等不同地方被同时处死。杀戮变得极度频繁,战争变得极度野蛮,以至于“30 年屠杀”看起来要更加适合对它的描述。<sup>⑨</sup>

对雅典而言,如此史无前例的战争首先造成了它们自萨拉米海战之后最大程度的

---

①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p.90–93.

② 在这场战争中,重装步兵会战并未造成不可承受的战场伤亡,在所有重装步兵对阵中,难得会有任何一场战场死亡率超过 10%,真正的杀戮发生在远离重装步兵会战的地方。参见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p.145–146。

③ Glenn Richard Bugh, *The Horsemen of Athe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94–95.

④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93.

⑤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264.

⑥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264.

⑦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p.175–182.

⑧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p.102–103, pp.191–199.

⑨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191.

短缺。<sup>①</sup>这种短缺除了直接影响帝国战争之外,更引发了普遍的社会失序与混乱。在此之前,作为掌权近40年的执政官,伯利克里为雅典人精心创造了一个城邦社会秩序。那时候,伯利克里联合其同党,培养并刺激民众对雅典的依赖。<sup>②</sup>他将从帝国附庸征收而来的贡金除了用于维持海军巡航以外,还用来建造庞大的市政公共工程,让那些因未受训练而留在雅典的工匠或者不适合出征作战的雅典公民能在这些庞大工程的建设中获得报酬,从而,他缔造了这样一种城邦秩序:年轻力壮的公民在对外作战中得到报酬,其他公民则从参与公共工程中获取财富。于是,无论年龄与身份,雅典人都能够从国家财富中分一杯羹。<sup>③</sup>成功驱逐修昔底德之后,伯利克里独自掌权的十余年足以让雅典人适应并深深依赖他创造出来的这种城邦社会秩序。然而大战爆发之后,原本用于公共建设的巨额资金被悉数投入战争之中,雅典社会秩序因此被突然破坏,大量民众丧失了可靠的生活来源。与此同时,伯利克里在战争之初制定的退守城池、避免与斯巴达步兵会战的策略,则让拥挤的雅典城突然之间聚集了超出其承载能力的巨量人口,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房屋居住,不得不在盛夏季节住在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之中”,<sup>④</sup>甚至不得不打破惯例,拥挤在神殿里。因而,对每个雅典人而言,战争成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灾难:“普通民众被剥夺了原来仅有的一点点的财产,而上层阶级丧失了他们在乡村地区建造的豪华的房屋、富丽堂皇的地产,并始终生活在战争而非和平之中。”<sup>⑤</sup>雅典人异常愤怒,雅典社会濒临失控的边缘,甚至连伯利克里都几乎难以应对。<sup>⑥</sup>另外,雅典公民在战争期间的大量死亡,则使伯利克里大约在20年前提出的限制市民身份的法律不再有实际好处,从而迫使他在战争第二年就提出废黜了它。<sup>⑦</sup>可以想象,同时必定还会有其他更多的法令因为战时社会的特殊性而失去原有

<sup>①</sup> 汉森评估了雅典的财政困境。他提到,仅就雅典舰队而言,理论上200艘战舰一年服役8个月,可能消耗掉近乎2000塔兰特的资金。战前,雅典对大约200个帝国附庸征收的年度贡金在500到600塔兰特之间。到战争的第三或者第四年,雅典城邦的财政已经接近破产。参见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269。

<sup>②</sup> 伯利克里“剥夺阿里奥帕古斯会议的权力,给予人民过分激进的自由”,“故意放松对人民的控制,政策投人民所好,经常举办盛大的表演和庆典,举行宴会和游行,以取悦群众,把自己的同胞当成孩童一样,用各种娱乐活动加以诱哄”。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90—291、295页。

<sup>③</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96页。

<sup>④</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99.

<sup>⑤</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05.

<sup>⑥</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05;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17—318页。

<sup>⑦</sup> 公元前451年,由于公民人数大量增加,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伯利克里所提议的法令,规定享有公民权利之人仅以父母双方均为公民者为限。此项法律从此一直被严格执行。而到了战争第二年,伯利克里被重新选为将领后,开始提出建议,废黜此项法律令,以免他的(同时也必然是雅典城邦其他很多家族的)姓氏和家族因为缺乏合法继承人而灭绝。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35页;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21页。

的作用。这迫使雅典人不得不依照情势需要重新摸索对内外事务的处理方法。伯利克里对新占领土地重新分配的规定和对伊吉纳(Aegina)岛屿的处置,便是这种情势性需要压倒帝国普遍道德原则的初步显现。<sup>①</sup> 战争以其制造的大规模的混乱和失序,诱使身处其中的雅典人相信,情势需要压倒普适正义。

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和烈度的升级,这场内战对雅典帝国的第二项灾难性影响逐渐浮现出来。那就是雅典人越来越无法遏抑的爱欲(Eros)。爱欲本是人之天性,在伯利克里时代,他刺激雅典人对权势的爱欲,鼓动他们为雅典帝国的荣耀而献身;他眼看斯巴达人对雅典的壮大难以安枕,更是“火上浇油,激励人们发扬积极进取精神,施展目标远大的抱负”。<sup>②</sup> 他向雅典人牢牢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雅典人有绝对的能力实现他们所要实现的一切抱负。这种信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伯利克里在执政的最后几年,不得不像专制君主一样,压制人们对外扩张的欲望。<sup>③</sup> 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推进,事态的实际形势远远超出了雅典人的预料。战争的社会后果开始动摇他们对伯利克里五体投地式的尊崇,<sup>④</sup> 雅典人开始讽刺、诽谤、谴责伯利克里在战争中的守势作风,甚至怀疑他的道德品性。<sup>⑤</sup> 随着伯利克里在战争第二年的突然去世,那被他激荡起来的雅典民众对外征服的帝国爱欲便突然失控,随时有迸发的可能。而继伯利克里被拔擢出来的克里昂和亚西比得,正要通过讨好民众获得至高的政治权势。于是,雅典人的征服欲望基本失去了内在限制。同时,在阿提卡地区,伯罗奔尼撒人接连不断地肆意焚毁雅典人的土地和农庄,故意做出挑衅的动作,让城池上的雅典人看在眼中,<sup>⑥</sup> 这大大刺激了他们的愤怒和复仇激情。仰赖强力扩张的欲望和强烈的复仇激情相互纠合,终于在残酷的战争进程中迸发出来,将多数雅典民众变成了“狂妄不羁、无法驾驭的烈马”,<sup>⑦</sup> 这些民众直接管理下的雅典帝国,也如同他们一样,在整个希腊世界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战争以其摧毁一切限制的本能,刺激雅典人摆脱一切对他们爱欲的禁锢,任性行事。

然而还不够。这场内战对雅典人最根本的变异很快表现出来,以一种营造普遍恐

---

<sup>①</sup> 据普鲁塔克记载,为了安抚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劳累和困苦,伯利克里就将公家的钱财发给他们,并且规定对新占领的土地要重新分配。伊吉纳的居民全部被赶出家园,整个岛屿用抽签的办法成为雅典人的产业。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18页。

<sup>②</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03页。

<sup>③</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00、305—306页。

<sup>④</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01—302页。

<sup>⑤</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17—318页。

<sup>⑥</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85, pp.99—100.

<sup>⑦</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91页。

惧、因而怀疑一切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打赢战争,雅典人投入了所有的财政积蓄,动员了一切能够参加战斗的帝国公民。战争乃是敌对双方赤裸裸的暴力对抗,充满了无尽的流血、杀戮、意外与死亡。这场大战的屠杀烈度史无前例,雅典人在战争中前所未有的伤亡比例大大改变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被灌输的为帝国荣耀而战的信条清除不了突然间殒命疆场的恐惧,代代传承的先辈勇敢战斗的光荣战胜不了新的作战方式创造出来的死亡,而毫无停歇的密集的城外作战则使他们不敢(最后变成不愿)对未来有更为深远的考虑。在战场上,力量是唯一可凭恃的东西,神祇、道德、法令全都变得无济于事。因而在那个“一切事务更多地与具体经验相关”的时代,<sup>①</sup>力量自然发展成大多数雅典公民最信奉乃至唯一信奉的东西。惊恐的雅典人现在极度害怕力量的衰落。在他们看来,帝国附庸作为雅典力量的重要来源,强化对它们的控制和榨取、严厉惩处它们的背叛行为,乃是维系雅典力量的有效手段;以残忍的暴力对待敌人,屠灭俘虏甚至滥杀无辜,乃是展现雅典人强大力量的必须途径。恐惧的雅典人在战争的重压下发现,以往一切关于帝国“仁慈”统治的说辞都显得“似是而非”。普遍的恐惧衍生普遍的怀疑。雅典人越来越怀疑一切势力都在密谋推翻雅典,不仅要打败雅典帝国,还要奴役雅典城邦。于是希腊世界一切不被雅典控制的势力都变成可疑和敌对的了。雅典在米洛斯的暴力屠杀、在卡马琳娜(Camarina)的远征辩护<sup>②</sup>都是源于这样的恐惧。

普遍的恐惧不分帝国内外,因而怀疑一切的氛围也不仅仅体现在邦际关系上。在城邦内,一方面,社会秩序的失控宣告了大量旧有法令的失效,势必会增加雅典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成本,降低彼此的信任度。而随着时间流逝,战争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雅典城内不同政治势力对战争乃至对雅典政制的看法也越来越对立。掌握了雅典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越来越担心有影响的政客借机推翻公民大会,剥夺他们仅剩的从担任公职中获取报酬的机会,或者建立僭主政治实施残暴的统治。战争的间或失利则会加剧他们对参战将领(虽经由推选产生,但多是当时雅典城内最有影响的家族或政客)的质疑,同时势必影响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并从某个时候开始在内心深底怀疑雅典。这种怀疑一切的情绪推动他们怀疑伯利克里无能赢得对斯巴达人的战争、<sup>③</sup>怀疑狄奥

<sup>①</sup> 梅耶著,王师译:《古希腊政治的起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sup>②</sup> 雅典人攸非莫斯(Euphemus)在卡马琳娜的帝国辩护是修昔底德全书中最后一篇对雅典帝国扩张的集中辩护,其中突出了对叙拉古的恐惧乃是雅典远征西西里的重要缘由。参见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350–353。

<sup>③</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17—320页。

多图斯对密提林的宽容提议乃出于私心、<sup>①</sup>怀疑皮索多勒斯( Pythodorus) 等三将军在西西里作战不力、<sup>②</sup>怀疑六将军在战场处置有误等。而对率军远征的亚西比得渎神的怀疑，<sup>③</sup>则使他们丧失了一个可能拯救帝国的年轻将领，<sup>④</sup>并间接导致了远征的失败。<sup>⑤</sup>这种神经质式的怀疑致使他们在长久战争中根本无法保持战略稳定性，从而使他们自己丧失了赢得大战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大战中越来越高的死亡率、越来越血腥的屠杀和越来越翻新的杀人方式，以其突破希腊世界一切已有的惯例、习俗、教条、信念、法令、道德、神性限制的表象，彻底击碎投身其中的雅典人对未来的憧憬，诱导他们蔑视一切在宁静与和谐的状态下高度推崇的道德律令，诱导他们只去追逐眼下的、现实的、短暂的享乐，而无视公共的、长远的、崇高的价值。那些亲自参与作战的公民，一旦回城休养，就会因为下次战争前景的不确定性而抓紧时间放纵享乐；那些不直接参战的公民，要么因为远亲的战死而突然得以继承大笔财产，无所适从，继而狂欢放纵，要么因为目睹了其他公民的放纵而歆羨效仿。于是整个城邦变得狂放、傲慢、目无法纪，陷入巨大的狂欢之中。<sup>⑥</sup>

由此，在帝国内外，战争制造的怀疑与恐惧相互强化，共同增进雅典人对暴力的信仰。随着战争的推演，他们越来越呈现集体癫狂的状态：当他们通过暴力赢得哪怕较小的胜利时，他们也会变得盲目自信，认为自己的暴力可以赢得一切；而当他们遭遇哪怕很小的失利时，他们就会变得极度悲观，急欲清除一切可能妨害他们力量的因素。于是，深思熟虑变成可笑的了，仁慈慷慨变成无用的了。战争借由死亡制造的巨大恐惧向雅典人昭示并迫使其接受自己的暴力逻辑：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要么被动忍受、要么遭到毁灭。

战争是一种依照其内在逻辑演进的暴力对抗，其中充满了深深的敌视和无法遏

---

①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150–151.

②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220.

③ 从表面上看，亚西比得因为被怀疑渎神而被判决。事实上，如下文所述，这个时候的雅典人对诸神的信仰已经徒有形式。雅典人真正怀疑的乃是亚西比得阴谋推翻雅典民主政治，建立僭主政治。所以，普鲁塔克证实，雅典民众“激动万分，愿意接受更多的指控，他们最初对这个案件所保持的热情并没有因为陈述而趋于缓和，任何人只要涉案，就会收到逮捕与下狱”。参见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335, pp.339–400；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378 页。

④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441–442.

⑤ 作为雅典远征西西里的鼓动者和统帅之一，害怕被雅典公民大会处死的亚西比得逃往斯巴达，并将雅典的帝国计划悉数告知，从而成功鼓动原本迟疑的斯巴达出兵援助叙拉古。参见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354–358。

⑥ 普鲁塔克提及，伯利克里过世之后，雅典变得“贪污腐化风行一时，各种罪恶极其猖獗，风气败坏到不堪听闻的局面”。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323 页。

制的激情,因而一旦开战,便会逐渐冲破任何外在限制,螺旋上升,直到一方被彻底毁灭。时间越长,烈度越高,战争受到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战争演化为完全由暴力和激情操纵的纯粹杀戮的可能性就越大。作为希腊世界史无前例的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制造了雅典帝国最大程度的短缺,引发帝国社会的失序与混乱;释放了人性深处的放纵爱欲,以其肆心(Hybris)将帝国事业推向了覆灭;创造了普遍的恐惧,将帝国带入了怀疑一切、反对一切的自然状态之中。这场战争持续近30年,打光了帝国在宁静与和谐状态下涵养出来的光荣雅典人,塑造出了全新的只信奉暴力和放纵的战争雅典人。极致的暴力将战场变成了地狱,而长久的战争则将整个社会变成了地狱。米洛斯城下极度推崇帝国暴力的傲慢雅典人,正是战争创造的地狱中滋养出来的物类的代表。因此,雅典帝国蜕变的根源,正是这场它倾全力投身其中的伯罗奔尼撒大战。

## 五 “偶然的”天灾:可怖战争效应的倍增器

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克劳塞维茨重点提到,战争中永远充满了摩擦阻力(die friktion),它们同偶然性相伴,时时处处都会发生,引发根本无以预测的现象,大大影响战争的进程。<sup>①</sup> 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同样强调,战争行动面临无法克服的组织风险,这种风险主要由各种无意的耽搁和小小的故事引起,近似于阻碍各种活动机械运转的“阻力”。<sup>②</sup> 这些阻力会极大影响甚至根本性颠覆战争行动乃至最后战果。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它最富有智识的领袖都未曾预料到的“偶然”:一场爆发于战争第二年并断续延续到战争第六年才基本结束的大瘟疫。<sup>③</sup> 这场“偶然”的天灾不仅对雅典的对外作战行动产生了巨大的阻力,更超出战争本身,在战争的大后方、在雅典城邦内制造了普遍的恐怖,将海外战场的恐惧扩散并放大到城邦内部,倍增了可怕的战争效应,进一步刺激了雅典的蜕变。

<sup>①</sup> 克劳塞维茨论到,战争中永远充满了摩擦阻力。战前的“庙算”都很简单,但这些“庙算”的种种规划一旦进入落实,就会变成最困难的事。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原来的安排都会进展得不顺利,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因而,“摩擦阻力”就成了区别实际战争和纸上战争的唯一概念。这种可怕的阻力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些地方,而是同偶然性相伴,时时处处都会出现,引发一些根本无以预测的情况,大大影响战争的发展。参见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p.119–121。

<sup>②</sup> 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8–13.

<sup>③</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96–100.本节所引对瘟疫的描述,如无另外注明,均出自修昔底德在这一部分的集中记载。

这场瘟疫对战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大削弱了雅典人可用于投入作战的有效兵力。修昔底德记述道，在雅典正规军队中，因瘟疫死亡的有将近 4400 名重装步兵和 300 名骑兵，在人民大众中，死亡人员不计其数。<sup>①</sup> 考虑到那时希腊世界的基本作战形态乃是重装步兵会战，而重装步兵的兵源主要来自拥有自由公民权和一定财产的城邦公民，这些因瘟疫而歿的兵士很可能是前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雅典帝国赖以维系统治的重要力量。根据汉森的研究，在这场瘟疫中，重装步兵、骑兵和第四等级等合计有 7 万到 8 万阿提卡居民丧命，并且很可能死于瘟疫的前几个月内。这意味着，在这场持续近 30 年的世界战争中，仅仅在战争开始，雅典便已经丧失了全部住民的 1/4 到 1/3。<sup>②</sup> 并且，这场瘟疫还摧毁了那个制定了审慎战略以赢得大战的卓越领袖伯利克里。<sup>③</sup> 换言之，雅典已经丧失了能够继续维持审慎帝国统治的大部分依赖。为了打赢正在进行的战争，他们必须强化对盟友的控制和汲取，必须加大力气尽可能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这样，瘟疫在第一层面上倍增了前揭战争自身创造出来的暴力逻辑。

然而这还只是表象。瘟疫的倍增效应在更深层次以更为彻底的方式蜕变着雅典。在外有强大作战压力的情况下，这场大瘟疫以其同样史无前例的“特性”极大地扰乱了雅典人对自己文明的认识。修昔底德记述道，在这场未知缘由的天灾中，雅典人如同坐以待毙的病弱羔羊，毫无希望可言。面对瘟疫，他们发现引以为傲的文明积累起来的一切科学（医学）知识都无能为力，研究它变得毫无可能；<sup>④</sup>一切曾经深受敬畏和尊崇的神祇和习俗都变得毫无裨益，从而被无情抛弃；<sup>⑤</sup>所有的患者，无论身体素来健壮还是孱弱，都在承受极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sup>⑥</sup>就连无可奈何地等死的过

---

①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73.

②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pp.79–82.

③ 在这场瘟疫中，伯利克里的个人状况与大部分雅典人一样，极为悲惨。普鲁塔克描述道，他难以幸免地感染了瘟疫，许多亲密的友人也因瘟疫过世，他的家庭出现长久的不和而且离心离德。他丧失了姊妹、大部分亲戚、朋友以及那些协助他处理政务最有成效的人士。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320—321 页。

④ “起初，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疾病，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治疗方法。而医生们自己死亡最多，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触最频繁”；“一种药物对一个患者是有益的，对另一个患者却是有害的。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比身体柔弱的人更能抵抗疾病。所有病人都同样地死亡，就是那些在饮食上特别注意的人也一样……”

⑤ “在神庙中祈祷，询问神谶，诸如此类的办法，都无用处”；“由于相互看护而染上瘟疫的人，像羊群一样地死去……由于无人照料，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朋友的家人终于被垂死者的呻吟搞得精疲力竭，他们已经屈服于瘟疫的力量，不再举行哀悼活动”。

⑥ “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都是突然地头部发高烧……口腔往外渗血……大多数患者干呕，产生强烈的痉挛……身体内部高热难耐……长时间的失眠和焦躁不安也一致困扰他们。”

程,也充满被命运玩弄的意味;<sup>①</sup>即便偶有侥幸病愈的,也不再完整如初。<sup>②</sup>死亡在城邦内变得处处可见,水源边、神庙中,到处都是死者的尸体。与海外各处的战场一样,雅典城内变成了可怕的人间炼狱。

如果说海外作战主要以我们前揭的方式塑造参战的雅典人,并通过他们的言行间接地影响城邦内的其他雅典人的话,这场瘟疫则把所有留居城邦的雅典人直接带入了与战场毫无二致的恐怖之中。通过制造巨大的生命痛苦和莫测的死亡,瘟疫诱使雅典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所有人都只能毫无差别地死去,敬畏者、不敬者、虔诚者、亵渎者、荣耀者、卑劣者、勇敢者、怯懦者,所有这些被文明社会区分为德行高低的人,在大瘟疫制造的死亡面前没有任何区分;违法者尚未未来得及受到法庭制裁就一命呜呼,遵守与破坏法律不再有实际意义;与战争中一样,富人突然死亡,贫穷的远亲突然继承巨额财富,人世变成了丝毫不可预料的天命。由此,瘟疫教化出来的雅典人“根本不知道今后会怎样,对世间万物都漠不关心”。<sup>③</sup>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会长久生存,死亡成了他们唯一可以预料的东西。于是,放纵恣睢、及时行乐成了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变得无视荣誉、缺乏节制、毫无远见、全无耐性、得过且过。而伯利克里曾刻意诱导雅典人对快乐的大胆追求,在此时也成为空前的无法无天和及时行乐的催化剂。这种放纵和前述由战争塑造的对暴力的变态推崇相呼应,使雅典人在处理外部事务时变得毫无顾忌、蓄意残忍、狂妄粗暴:雅典人德性的堕落终于引发了城邦的堕落,并污染到帝国的决策。<sup>④</sup>处理密提林叛乱时的“短视”与“野蛮”,正是堕落雅典人具象的写照。

实际上,这场战争中的“偶然”不止大瘟疫。修昔底德记述道,在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优卑亚、波奥提亚、斯巴达等,几乎整个希腊世界,接连发生饥馑、旱灾、地震、海啸、狂风等,完全出乎任何一方的预料,都极大地影响了处于战争中的各个城

<sup>①</sup> “到最严重的程度时,病人的身体非但没有衰弱,反而有惊人的能量……大多数病人都是在第七或者第八天由于内部的高热而死亡。如果患者度过了这个时期,病痛便进入肠道,出现严重溃烂……由此病人气力衰竭,就这样死去了。”

<sup>②</sup> “许多人丧失了生殖器、手指和脚趾的功能,还有人丧失视力。有些人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认识自己的朋友。”

<sup>③</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99.

<sup>④</sup> 玛丽·威廉斯著,陈开华译:《修昔底德笔下的个人与城邦》,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邦。<sup>①</sup> 这些完全出于“偶然”的天灾，以其毫不逊于同期战争的破坏性，与频繁的海外作战一道，将所有雅典人（和所有希腊人）从一个宁静和谐的光荣城邦推到了充斥着死亡和巨大恐怖的可怕地狱。他们因天灾的无助而惧怕死亡，连带触发他们更加恐惧战争中那可怕的屠杀；他们因战争中频繁的屠杀而战栗，连带触发他们对大天灾的痛苦记忆：在这场伯罗奔尼撒大战中，天灾与战争之间就这样产生了难以割断的联系。天灾也就在多个层次上变成了战争可怕释放效应的倍增器，强力加速了雅典的蜕变。

## 六 非唯雅典：希腊城邦的普遍堕落

史无前例的大战与天灾将雅典蜕变为他们原本所彻底否定和坚决反抗的那种人（或政体）。这可算作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悲剧。然而这种蜕变绝非仅仅发生在雅典身上。这场大战的军事失败者最终崩溃了，丧失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帝国荣耀，成为一个它所蔑视的强权的随从。而战胜者同样倒退了，丧失了它坚守不移的政治品性。所有的参与者，也都和它们一样，遭遇了重大的创伤。修昔底德（及同样出色的色诺芬，Xenophon）为我们呈现了在斯巴达、科西拉、西西里，在所有卷入这场大战的希腊城邦，战争如何像摧毁雅典那样无可挽回地摧毁美好、催生堕落，终结雅致的希腊文明。

在斯巴达，一如在雅典，随着战争的演进，一切对暴力的限制、一切希腊的正义和风俗、一切斯巴达引以为傲的德性，都被撕得粉碎。<sup>②</sup> 在战争的第五年，斯巴达经久围攻下的普拉提亚人被迫投降，经过“戏剧性”的审判之后，<sup>③</sup> 斯巴达屠杀了大部分的降众，普拉提亚人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城邦和土地，成为流民，这甚至要比雅典人野蛮处置密提林还早一年。为了弥补在派罗斯的失败，斯巴达不得不违反城邦惯例，允许伯拉西达（Brasidas）一个人在希腊北部以他们固有的个性绝不会接受的解放精神发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指出，正是战争的恐慌迫使他们在一

---

<sup>①</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3, p.173.有一项关于地震如何给斯巴达造成重大影响的精彩的现代研究值得关注，参见 Stephen Hodkinson, “Inheritance, Marriage and Demography: Perspectives upon the Success and Decline of Classical Sparta,” in Anton Powell, ed., *Classical Sparta: Techniques Behind Her Succes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103–104。

<sup>②</sup> 关于大战中斯巴达城邦的蜕变与堕落，近来中国学术界有一项颇有见地的分析，可参见李隽旸：《斯巴达进入海洋：战略僵持、外交革命与德行溃败》，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08—113页。

<sup>③</sup> 刘飞涛：《审慎和节制：权势与道义的脆弱纽带》，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52—153页。

较短时间内、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采纳了这样一个宽大的政策。<sup>①</sup> 为了在越来越漫长的战争中打赢雅典,资源与兵力均极为短缺的斯巴达背离了他们先祖浴血坚守的泛希腊主义路线,转而投靠他们先前始终对抗的波斯帝国,以近乎附属的方式争得波斯的金钱与舰队支援。他们不得不放弃自立法以来在血统和出身上的严格限制,拔擢出身大有问题的莱山得等混血将军,从而扰乱了城邦政治的基本秩序。而对雅典的战胜和从波斯输来的大量金钱,则将一个胜利了的斯巴达城邦蜕变成了腐败的帝国:金钱成为原本与之绝缘的斯巴达“许多恶行的根源”。<sup>②</sup> 更不容忽视的是,混血的莱山得在赢得大战之后,迅速积累了远超过斯巴达能够消化的个人影响,以其与波斯君主的私谊、以其对军队的巨大控制力,将整个斯巴达变成了他的“私人帝国”。城邦面临堕落为“私产”的危机。<sup>③</sup>

在西西里,战胜了雅典大军的叙拉古情形与斯巴达相似无二。政治腐败、金钱腐蚀、僭主统治大行其道,战胜也诱使叙拉古对其他城邦展示帝国统治的野心,从而在不久之后重蹈了雅典自伯利克里之后的帝国覆辙。

而在点燃了战争导火索的科西拉,情形则更为悲惨。战争第五年,科西拉爆发大规模内战式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党派冲突超越了政治限度,演变为大规模的相互屠杀;私仇借正义之名快意报复;伦理道德被漠然置之;神圣法则被视若惘然。<sup>④</sup> 人性的一切丑陋和对暴力的肆意滥用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随着大战的延续,整个希腊世界像科西拉一样的“城邦内战”不断增多,阴谋政变、种族清洗越来越频繁。身处其中的希腊人道德心志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滑坡,变得极度低劣:侵略被当成勇敢,耐性被当成无能,克制被当成软弱,阴谋被当成机智,极端被大力颂扬。一言以蔽之,战争促使希腊人对原来那些崇高美德进行了完全的颠倒。战争中的人性已经普遍堕落。希腊文明在史无前例的战争中开始“停滞”。对此,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深刻地指出:“战争是毁灭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高级的毁灭。它不但削弱了希腊

<sup>①</sup>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222.

<sup>②</sup> Charles Fornara, *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Documents of Greece and Rome (No.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98.

<sup>③</sup>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804—806、810页。

<sup>④</sup> 修昔底德记述了这样一幅“革命”的图景:“(失败的科西拉贵族党人)拒绝受审,在神庙中彼此相互杀死;有些在树上吊颈,有些用其他各种方法自杀……科西拉人继续屠杀自己的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有些是因为债务关系而被杀……正如在这种形势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人们往往趋于各种极端,甚至还要坏些。有父亲杀死儿子的,有从神庙中拖出或者就在神庙上屠杀的,有些实际上就是用围墙封闭在道尼修斯神庙中,因而死在里面的。”参见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69。

世界的力量和财富,而且还毁灭了希腊性,引发了重新的野蛮化。希腊世界经久积累的希腊性曾经缓慢战胜了他们最原始、最凶残的野蛮,而现在这种野蛮又重新出现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sup>①</sup>正是以其内生的摧毁一切的暴力逻辑,这场大战彻底毁灭了希腊人引以为傲的力量、财富、艺术、文雅、秩序、勇敢,甚至包括对真理的探寻和对早期史诗传说的理性怀疑,造成了衰弱、贫穷、野蛮、喧闹、混乱和恐惧,造成了希腊世界的普遍堕落。

## 七 结语:垂诸久远的教益

战争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化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战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战争是赤裸裸的暴力对抗,是一个武装集团对另一个武装集团的暴烈的行动。<sup>②</sup>战争有其固有的能动逻辑,会深刻影响乃至重新塑造投身其中的一切人物和集团。在对希腊战争的描述中,在对普遍内战造成的城邦衰败、道德崩溃和文明堕落的论述中,伟大史家修昔底德不无悲悯地感慨道:“战争乃残酷之师。”的确,战争会产生一种能动的释放效应,教唆人们诉诸种种可怕的事情,那是他们在安宁和平时期以人的理性谋划永远不会或不敢考虑的。通过这种可怕的释放效应,战争把自诩高尚的雅典人变得残暴无度,把推崇自由的斯巴达变得附庸强权,把典雅有致的希腊世界变得野蛮恐怖。这场由希腊人自己发动起来的超级内战,最后以完全超出任何一个希腊人想象和控制的结果,彻底变异了整个希腊。

我们意欲以战争的能动逻辑解读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叙事。通过考察雅典自击败波斯之后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主要的言辞与事行,我们明确了战争前后雅典帝国从审慎节制的仁慈帝国到蛮横专制的残暴帝国的蜕变。继而,我们从制造普遍短缺引发社会失控、刺激个体爱欲压倒帝国公益、制造普遍恐惧引发普遍怀疑等三个层次揭示了战争如何彻底地、根本地改造了大战中的雅典帝国,并从战争“偶然”的角度,分析了瘟疫等多种根本不可预知的天灾如何与大战的可怕释放效应互相作用,一道将战争的恐怖推向极致,从而助推了雅典的蜕变。我们还发现,这种蜕变不仅仅发生在雅典,事实上,所有卷入战争的希腊城邦都普遍发生了蜕变,整个希腊从高度文明重新回到了彻底野蛮。

① Leo Strauss, “Thucydides: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History,” p.84.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 页。

通过这种视角的解读,我们可以体悟道,修昔底德或许绝非仅仅希望通过著书揭示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的结构性缘由,<sup>①</sup>也不仅仅旨在为伯利克里的战争责任开脱。<sup>②</sup>通过对战争中死亡、屠杀的可怖描述,通过对瘟疫中凄惨画面的连篇累牍的描述,作为一个曾经投身其中并随后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思考十几年的哲人,修昔底德大概看到了充斥着激情、仇恨、暴力、死亡、荣耀、怯懦等种种表象的战争的深刻内涵,那就是战争的能动性:一旦发动,它势必要以其内在的逻辑冲破发动者的控制,凭暴力与激情彻底改造人世的一切。而在此之中,人反复体验的就只有苦难,永远不带有任何的慰藉。这就是人类在战争中的残酷真相。正如尼采所言,对于一些惨绝人寰的真相所具有的洞察力会使人失去任何慰藉。人一旦发现了这种真相,他就会看见到处都是恐惧或荒谬的存在。<sup>③</sup>修昔底德不幸拥有了这种洞察力,在对战争第十一年的插论中,他写道:“我始终生活在战争之中。我老了,我看到事情的真相,我懂了人世的意蕴。”<sup>④</sup>无限哀婉,尽在其中。战争乃残酷之师,这是他看到的真相,恐怕也是他真正意欲垂诸久远的历史教益。

(截稿:2016年12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sup>①</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3.

<sup>②</sup>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372.

<sup>③</sup> 尼采著,杨恒达译:《悲剧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sup>④</sup>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270.